

章开沅先生的最后岁月

□ 周洪宇

章开沅先生的去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是章门弟子,所有了解章先生的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在以各种方式悼念缅怀先生。先生的学问道德、人格魅力就像一块吸铁石,让无数人感动和崇敬。

夜深人静,端坐桌前,这一年与先生有关的点点滴滴,忽然一一浮现于脑际。

最后的一年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先生遇到了晚年生活最大的一个坎。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华中师范大学按照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要求,严格防控。先生和师母虽然年事已高,但平素最不愿意麻烦他人,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家中虽然请了阿姨,但阿姨不住家里,此时只能定时代购日常生活用品。疫情初期,由于交通阻隔,物资紧张,新鲜蔬菜水果等一时都难以得到。因校医院一时关停,老人日常所需药品也断顿无供,影响了治疗。现在想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先生这样九十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我得知情况后,深感问题严重,不宜久拖,必须尽快解决,特别是听说先生在近代史所附近台阶跌倒,更是心急如焚。先生此前曾委托我打听本地养老院情况,我找学生朋武帮忙,当即与一家养老机构取得联系。电话沟通后,我有些不放心的,还专门驱车先到现场实地“侦查”一番。经过比较,觉得这家机构最适合当下状况的先生。此前,先生和师母曾亲自到此处看过,并在一棵开满紫花的树下留影,笑容灿烂,显然印象不错。我以为既然如此,先生入住此地应无问题。没想到,当我将有关情况向先生和师母汇报后,两老仍然顾虑重重,只得与先生女儿章明明和师母等人商量,看如何劝说二老尽快入住养老机构。

这一期间,同学们都很关心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海南的宪生、深圳的国灿、广州的王杰、开封的小泉、南昌的艳国等外地同学纷纷来京。潘岳师兄出差来京,行前在京专门与夫人到商场精心为老师选购了一件衣服,还提出要到先生家里登门看望,我与马敏、南生师兄陪同。不巧前一晚先生在师兄家又摔了一跤,听说还是住在同一单元的福惠师兄帮忙扶起来的,无法接待我们。大家得知后都很着急,深感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只有马上入住养老机构,随时有专业医护人员陪伴与治疗,一切才有保障。潘岳、马敏和我三人轮流电话劝说,先生和师母有所松动。后来经过各方工作,先生和师母终于在2020年12月26日住进楚园。我们紧张的心情才稍有缓和。

我与这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约定,及时告知先生和师母入住后的情况,以便掌握协调。记得入住当天上午,负责人就告知,先生肺部的病状有点大,加上前期缺乏专业护理,皮肤有压疮。按章先生家人的想法,他们会在不增加先生身体负担和创伤的情况下精心护理,尽最大努力延长先生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让他住得开心。我还看到先生与他的老朋友刘道玉校长以及楚园工作人员的合影,看来情况还不错。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无法陪同进园,只能表示回汉后找时间看望并感谢大家。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先生入园后恢复不错,五天后来,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特别是5月初我的另一位恩师、硕士生导师93岁高龄的董宝良先生去世后,就提醒督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赶紧编辑出版先生生前整理的《回忆录之道——章开沅口述史》。此书是我任总主编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一册,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前列的一批知名大学书记校长,如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道,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史维祥,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杨叔子等人的口述史,开沅师也是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自然也在丛书之列。

为了确保这套口述史的真实



章开沅先生生前在书房的留影

候一切恢复正常。这位负责人还发来几张先生做手工的照片,看到先生和师母开心的样子,得知两老的身体都在康复之中,弟子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先生一定能战胜病魔,安度百岁。

先生是个时刻都在关注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人,尽管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仍然密切关注国家和世界局势发展,思考疫情对民族与人类未来的影响,经常与住在一起的刘道玉校长等人交流看法。华中师范大学组织师生结合疫情展望教育改革,先生知悉后撰文一篇,畅谈所思所得,并给学校加油鼓劲。

先生的文章题目很有趣,叫《野叟献曝,三言两语——疫后教育变革展望》,文章写道:“何谓‘疫后’,何有‘疫后’?‘新冠’肆虐,乃是现代人类文明危机,又一次大暴发,源远流长,日益张狂,仿佛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何谓‘常态’,何有‘常态’?我们必须正视‘常态’的心理对待现实的‘非常态’。疫情高峰,诚然必须集中全力奋勇抗击,但民生自有全局,我们总不能被小病重夺牵着鼻子走。但此次疫情之严重空前绝后,对世界,对中国,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全方位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因势利导,尽量往正确方向前进,切不可痴心妄想,一切恢复如旧。”

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岂能长期中断,理应尽早复课。网课诚然已经发挥巨大作用,但毕竟代替不了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与情感交流。桃李芳菲,生机勃勃,这才是校园应该恢复的常态。”先生在文末特地加语:“华师加油!”

从先生这篇短文,足见先生的格局之大,视野之广,思虑之深,情怀之浓。95岁高龄身患重疾的老人尚且如此乐观豁达、心怀天下,足令晚辈后生汗颜。

最后的一月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先生入园后恢复不错,五天后来,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特别是5月初我的另一位恩师、硕士生导师93岁高龄的董宝良先生去世后,就提醒督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赶紧编辑出版先生生前整理的《回忆录之道——章开沅口述史》。此书是我任总主编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一册,包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前列的一批知名大学书记校长,如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道,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史维祥,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杨叔子等人的口述史,开沅师也是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自然也在丛书之列。

为了确保这套口述史的真实

学人小传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1926年7月8日生于安徽芜湖,2021年5月28日在武汉去世。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后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1983年至1985年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1985年至1991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略》等。

性、客观性和可信性,几年前我与出版社就定了个规矩,每本书的整理者,最好都是传主的弟子或助手,如果可能的话,请当事人自己来完成。道玉、楚廷两位校长就是亲自动手,不假他人。先生口述史的整理者,我最初考虑请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与先生平时接触最多、情况最熟悉的师兄们承担,但一了解,他们都在忙于协助整理出版先生的那套多卷本文集,一时无力顾及;后来考虑请先生的助手刘莉博士承担,一问,她也在协助先生整理最新版的《章开沅自传》,这本书是继谭徐锋策划、彭剑整理、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章开沅口述自传》之后又一本重要自传,先生很看重此书,不惜心力,费心口述,刘莉也为此投入很大精力,暂时无暇他顾。

出版社负责人了解这些情况后,认为时间已过去数载,其他传主的口述史大多已出版,此书不能再延迟下去,便督促我自己来做。我到近代史所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专门来回顾与反思上世纪80年代前后高等教育改革史,对当今高教改革也有助益,可以试试,但也明确表示他现在精力有限,无法再专门费时口述,只能应对几次,其他都靠我自己设法整理。刘莉很帮忙,听了此事,主动把其整理的口述自传初稿中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容给我参考。我自己身兼数职,平时事务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开始时还当面请教了先生几次,但后来一忙,整理工作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和平时与先生联系甚多的学校宣传部小党分合作,加快整理,初稿出来后又请我的研究生郑媛协助补充了许多新资料,终于在去年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我将这些情况向先生作了汇报,他很欣慰,鼓励有加,认为可以与其他几本口述自传形成互补。

5月上旬,我请小党尽快把书稿配齐相关照片交给出版社,并不时询问编辑工作进展,希望先生在精力尚充沛之时能亲自把关。我怕伤先生视力,还建议出版社在书

稿编辑完后务必打印一份大字号的清样,以便先生审核。谁知负责该书具体编辑工作的同志特别谨慎小心,遇到疑难问题常常反复核实,以致编辑进度较慢,先生督促多次,也无济于事。先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我们不提他也不问。但后来听师母说,先生临别前几天,有两个愿望与她频频提及,一是想回桂子山的家里住住,二是想看看书出来没有,而“书”可能就是指这几本口述自传。听到此言,我感到无尽的后悔。如果当初不犹豫再三,自己动手,早日完成书稿,时时督促出版,或许可以让先生在生前见到这本专题口述史。

最后的一周

先生生前最后一周,5月24日(周一)上午10时45分,养老机构负责人来告,从上周开始,先生就偶有低烧及呼吸急促的症状,血氧饱和度低,给予低流量氧气吸入后好转,有时还会神志恍惚,答非所问。上周五开始频发房颤,状态比较危险,章明明周三晚上赶回了武汉,华师校领导也前往看望。因为尊重先生意愿,要有尊严地走,从容地离开这个世界,家人明确要求不做器官切除手术,只对症治疗,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所幸周末期间状态比较稳定,情绪和饮食都不错。

我听说这个情况,感到情势不妙,当天下午3时多,我与夫人一起到花店买了一大束康乃馨去病房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刚刚午休醒来,头脑仍然清晰,看见我们来了,打了招呼,但说话声音很小,不细心几乎听不见。我弓着身子听他讲话,问他近况如何,他把右手从床被里伸出来,与我紧紧握着,手掌依然温暖如初,但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手掌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厚实有力了,软绵绵的,似乎生命的能量正在逐渐耗尽。先生眼含热泪,我也强忍着泪水,师徒四人四目相对,一时无语凝噎。夫人见势趋前向先生问好,没想到先生竟然还记得她的名字,让她感动莫名。我也觉得奇怪,夫人陪我拜谒先生的机会并不多,但他竟清楚地记得弟子眷属的名字,可见他心中不仅装满了学生,也装满了学生的一切。学生们在他的心中永远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这之后,养老机构每天都会给我发先生的动态和照片,开始还比较正常,各项身体指标趋于稳定,先生可以下床吃饭,而且从照片上看,五菜一汤,营养丰富,胃口不错,吃得很有香。但从去世前一天(27日)早9时发的照片看,精神状态显然很弱,虽然可以起来坐在床边,但面容十分憔悴,岁月无情催人老啊。我和夫人看了,心里发紧,祈祷老天保佑先生渡过难关。

5月28日早上8点30分左右,养老机构忽然来电话,我心里一惊,顿时有种不祥之感。果然是噩耗,先生在十几分钟之前平静地走了,此事还未告知师母,大家不知如何对师母开口,担心她老人家接受不了。我为稳妥起见,没急于马上在“桂子园群”微信群里向各位师兄报告此事,决定还是先到现场参与后事办理再说,这是当务之急。赶到养老机构的医院时,学校校办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年轻同志也已到达,我们几人逐一到病房向先生鞠躬致哀。

此后,马敏师兄、郝芳华校长、彭南生副校长、陈迪明副书记等人也到了,众人向先生的遗体默哀告别,然后看望慰问侯黄师母。凌凌云书记在新疆出差,听说后马上来电话指示工作。大家一道研究后事,直到下午3点多。

5月30日上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我和夫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与学校师生、章门弟子以及社会各界近千人,共同送别先生。看着先生的遗像,想起师母对我提及,先生生前最喜欢用我从先生故乡湖州荻港买回送他的一套茶具品茶,泪水不禁再次夺眶而出。先生晚年思归,常常从故乡来人处的片段信息,勾起对江南故乡的无穷思念,如今先生终于可以魂归故里了……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每年秋天,桂子山上的桂花芳香四溢,每一个走在桂子山上的人都会感受到桂花送来的一缕缕温馨与关爱,每一个到过桂子山的人都会长久地思念那桂花的温馨和关爱所留下的不泯的记忆。

可是,今年的武汉还没有等到秋天,没有桂花开放,只有阴雨绵绵。

5月28日早上,章开沅师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和妻子刘青很是震惊和悲伤。近一年多来,从师友们分享的一些照片来看,章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如2019年1月20日我们回武汉看望他时那么好了。章先生坐在轮椅上的样子,让人倍感怜惜。他曾对我说过多次,老人能不坐轮椅就尽量不要坐,坐上去就很难下来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坐上轮椅的。

29日晚上,我和王奇生、虞和平老师乘北京至武昌的火车,去送我们的恩师最后一程。在回汉的火车上,我们三人都分别回顾着章老师生前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回想恩师多年来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师恩难忘!

第一次见到章先生,我还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1987年春季学期,萧蓬父老师应华中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政法学院的邀请,为该院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课程,我与另一位同门每周都要陪同萧师从珞珈山一起乘车来到华师7号教学楼的课堂,一边听课,一边录音(课后整理萧师的讲稿)。记得有一次,我和萧师刚一走出7号教学楼,一位戴着墨镜、中等微胖身材的学者正经过教学楼前,热情地跟萧师打招呼:“萧老师,你每周来为我们的学生上课,真是辛苦了!”“开沅,你客气了,这是我们该做的。”我这才知道眼前就是鼎鼎大名的章开沅校长。从他们的寒暄,就知道是老朋友会面。后来我得知,章师在当校长期间,经常抽出时间到校园各处转转,以便及时了解学校的情况。那次章师戴着墨镜,讲话声音洪亮,让我这个还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青年学生觉得他气度非凡,心生敬畏。

硕士毕业后,我到华师历史研究所(后来改为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因章先生还在校长任上,校务繁杂,亲自参加研究所的活动并不多。直到1994年,他完全脱离了之前的各种行政事务而专注于教学和科研,我和王奇生、余子侠等正式拜师名下,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我们之间才有了逐渐加深的师生情谊。

奇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章先生没有给我们几个博士生开设专门的课程,只是偶尔做个讲座,这应该是误忆。1994年9月开学的那届五位博士生,是章先生招收博士生最多的一届。他专门给我们开设了一门研究课程,课程名称已忘记了,每次都引导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尤其是着重介绍他前几年在海外讲学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些经验和前沿问题,也请一些来访的海内外学者为我们做讲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接到某社团驻会负责人打来的电话,请我们这个主席今天务必去参加一个会议,电话里说,这样的会议本来不多,也约好了上边的领导参加,但被我拒绝了。他们通知我太晚了,我是个教师,教学是我的天职,社团主席是我的兼职,我不能放下教学临时去开会。”他说话时的那种坚定和从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一直影响着我真地坚守每一次课堂教学。我也一直要求我的研究生,走上教学岗位后应当以他们的师公为榜样,认真准备和讲好每一节课。

之前曾听年长一辈的同门师友说过,章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生们都很敬畏他。我和奇生拜师名下时,章先生已年近七旬,可能是我们与他之间年龄差距比较大,他对待我们更多的是体贴、鼓励和关爱。

约在1998年夏季,我陪章师带着原内地会负责人戴德生的孙子戴绍曾去庐山图书馆,访寻内地会和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庐山上的遗迹。当时庐山宾馆是山上唯一的高档宾馆,如果不是因为陪同外国客人,一向俭朴的章先生不会住进这么贵的宾馆。为了节省费用,他要我与他同住一个标准间。我以前虽然也少出差,但未曾住过这么好的宾馆。晚上,章先生教我如何使用宾馆的沐浴设备,避免淋浴时使水溅出来。他说他人睡很快,但是容易打鼾,就特意让我先睡,他到外边先转一下,等我睡着了他再进来。我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起床时,发现章师已经到外边散步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才开始洗漱。我知道他是早上起床时,看我还在睡着,怕影

响我,没有洗漱就先外出了。这次陪他到庐山旅行,虽然时间短暂,但是我亲身感受到他父亲般的照顾,深受感动,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与他人的相处之道,最重要的是谦让,能够理解他人、照顾他人。

我到华师工作前,一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读硕士时是跟随萧蓬父、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学的人通常只重视思想史文献,不大重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大量史料,也不知道如何搜集各种史料。来华师后,我看到各位师友都在近代史学领域卓有成就,一直有些担心能否待得下去。我后来选择做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在研究所各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到各地搜集档案、报刊和文史资料。

有一次,我陪章先生出差,谈到研究近现代佛教史的一些想法,他说这个路子是对的,任何历史事件和思想理论的发生、演变,都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研究者既要抓住主要因素,也要考虑到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这样才能使思考更加深入。他还鼓励我说,各学科间的界限都是人为设置的,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或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容易发现新的问题,使研究的领域突破固有的局限,也会使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宏维教授也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章先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所,虽然重点是在近现代史研究,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近现代史,应当鼓励和借重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这样才能推动史学研究迈向新台阶。他举了一些欧美学者的例子,说许多著名学者其实都是在进行多学科的大史学研究。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不仅体会到章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更深刻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理解完全超出了学科的界限,从传统的史学认识进入到一种大史学的观念。这使我想起了马恩“我们仅仅知道有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论述以及法国科学史学家布洛赫的话:“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这些都是说无论是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具备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的历史研究难免存在缺陷,也很难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可能正是因为章先生具有多学科的视野,非常重视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才能结交著名哲学家萧蓬父教授这样的挚友。我曾听萧先生说,他与章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武汉地区比较活跃的年轻学者。1961年,章先生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而萧先生也受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授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那时,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还不多见,这两个会议分别邀请了全国学术界和哲学界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们分别在这两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两次学术活动,使他们俩彼此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也因此结成了终身的友谊。

我离开武大后,每次回珞珈山看望萧先生,他都要询问章先生的最新消息,并要我代他向章先生问好,总是要我多向章先生请教,好好地问问历史所其他老师学习。萧先生年长章先生三岁,章先生不仅尊称萧先生为学长,更在公开场合称呼他为“萧老师”或“萧先生”。我陪章先生出差到外地,他总是向别人介绍我“是武汉大学萧蓬父教授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我知道这是他有意的谦辞,是他对老友萧先生的尊重。



萧蓬父(左)与章开沅

犹忆桂子山上花开时

□ 何建明

进入21世纪,年近八旬的萧蓬父老师身体明显变弱,极少出门参加学术活动。章先生有一次向我问起萧先生的情况,我如实以答,他感已几年没有见到萧先生了。我于是决定找机会邀请二老在一起茶叙。2001年教师节,桂子山上桂花飘香,一向喜欢鲜花的萧先生和师母卢文筠教授来到被桂花簇拥的华师近代史研究所。那时,萧先生已拄了拐杖,章先生则显得年轻很多,他们相见甚欢,有谈不完的话。不过,他们不是在叙旧,而是谈论当前学术界的情况,交流各自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其他几位也偶尔插话,发表看法,不时爆发阵阵笑声。当时,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还非常有限,通常都是好几位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华师近代史所因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每位研究人员都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萧先生很是羡慕,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特别与师母到我的办公室参观,并合影留念。他因此也赞扬章先生带领的华师近代史研究团队多年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所以才换来了这样的科研条件。晚餐时,二老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美食家,一边品尝菜肴,一边交流着学术热点,给我们几位上了一堂十分生动又有意思的课。

萧先生去世后,章先生很悲痛,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学殇”。当他得知我与几位萧门学生每年定期在乐山萧蓬父教授纪念馆轮流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时,他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继承学术传统、纪念萧先生的最有意义的形式。

章先生非常赞赏楚图南先生为戴章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守真知启后人”,他正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南京大屠杀”提供铁证而远涉重洋搜集重要史料,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特别是为培养年轻一代的学术接班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他都力破门户之见,“甘当铺路的石子”,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20世纪50年代初,华师尚未从昙华林迁到现址,如今的桂子山还被称作“鬼子山”,山上布满了坟墓。章先生是改变“鬼子山”,建设桂子山的首批耕耘者和奉献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使如今的桂子山成为闻名全国的最大桂花生产园。我相信,人们在欣赏和品味桂子山上的桂花芬芳之时,一定会想念起那些曾经种植和呵护桂花嫩苗的先驱者,感谢他们的辛劳和奉献!

章老师,我们永远想念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